



◎ 杜威访问中国时与胡适等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杜威 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1919年4月）



◎ 胡适与杜威（约摄于1940年）

整理说明

本卷收译文 57 篇,其中笔译 42 篇,口译 15 篇。汇编成单行本的有《杜威的五大讲演》(1920 年 6 月北京晨报社出版)、《短篇小说》第一集(1919 年 10 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短篇小说》第二集(1939 年 9 月亚东图书馆出版)。《杜威的五大讲演》中的《伦理学讲演纪略》难于确定是胡适所口译,只能割爱,书名也相应改成《杜威的四大讲演》。所有译文,先列单行本,余下按翻译或出版的日期为序。收入《尝试集》和《尝试后集》的译诗,为免与《胡适全集》第 10 卷重复,本卷从略。

目 录

杜威的四大讲演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3
教育哲学·····	95
思想之派别·····	193
现代的三个哲学家·····	254

短篇小说第一集

译者自序·····	299
最后一课 [法]都德·····	301
柏林之围 [法]都德·····	306
百愁门 [英]吉百龄·····	313
决斗 [俄]泰来夏甫·····	319
梅吕哀 [法]莫泊三·····	325
二渔夫 [法]莫泊三·····	330
杀父母的儿子 [法]莫泊三·····	337
一件美术品 [俄]契诃夫·····	344

爱情与面包 [瑞典]史特林堡·····	350
一封未寄的信 [意]卡德奴勿·····	359
她的情人 [俄]高尔基·····	370

短篇小说第二集

译者自序·····	379
米格儿 [美]哈特·····	381
扑克坦赶出的人 [美]哈特·····	396
戒酒 [美]哦亨利·····	410
洛斯奇尔的提琴 [俄]契诃夫·····	419
苦恼 [俄]契诃夫·····	432
楼梯上 [英]莫理孙·····	440

单篇诗文

暴堪海舰之沉没·····	449
生死之交·····	451
西洋笑话·····	455
六百男儿行·····	457
缝衣歌·····	459
军人梦·····	462
惊涛篇·····	464
金玉之言·····	467
晨风篇·····	475
国殇·····	476
译德国诗人亥纳诗一章·····	481
乐观主义·····	482

康可歌·····	483
大梵天·····	484
娜拉·····	486
美国法学家合拟《国际联盟条约草案》·····	515
国际联盟组织法·····	527
美国之民治的发展·····	535
现代教育的趋势·····	554
政治与民意·····	574
学问的新问题·····	580
杜威博士在山西之讲演·····	588
奏乐的小孩·····	600
西方思想中之权利观念·····	602
世界底新闻事业·····	608
大学之职务·····	612
新孟禄主义·····	621
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	627
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 ·····	638
从美国的历史经验上论联邦制度的得失·····	648
竖琴手·····	656
正统哲学的起原·····	657
罗宾生教授为《人与医学》中译本写的序·····	675
心理·····	678

杜威四大讲演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①

一

我很感谢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尚志学会和新学会，使我今天得来此讲演，实是我国际的荣誉。

我这十六次讲演的题目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便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学说。诸位须知学说发生在后。正如人先会吃饭，然后有生理学、卫生学；先会说话，然后有修辞学、文法学、名学。社会与政治的哲学亦然。人类先有制度、风俗、习惯，然后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人类有一种天性，遇需要时，自有一种动作去适应他的需要。例如饿了要吃，倦了要睡，久而久之，便成习惯了；却从没有人发生过疑问：吾们为什么要这样？这样了便如何？不但没有人发生过疑问，并且不许别人发生疑问。有许多

① 这是杜威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的讲演词，自1919年9月20日起，共讲16次，由胡适口译，毋忘笔记。载1919年9月21日至1920年3月29日《晨报》；又载1919年9月24日至1920年4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又载1919年12月《新青年》第七卷第1号；收入1920年6月北京《晨报》社出版的《杜威五大讲演》。——编者

志士往往对于制度、风俗、习惯发生疑问,以致牺牲了性命。历史上的证据很多,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e)便是个最显明的证据。只因他喜欢发生疑问,人家便加他个妖言惑众、引诱青年的罪名,把他毒死。这便是最初社会不喜欢学理的证据。

这样说来,凡是思想和学说,都是讨人厌的东西,便应大家从了制度、风俗、习惯走,如何还会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发生呢?大概思想学说的由来,都在遇着困难的时候。譬如走路,遇了困难,才发生造舟车的思想。不但个人的思想如此,便是人类共同的思想,亦复如此,总要一切制度、风俗、习惯,到了一个时代,或者不适,然后才有社会的思想与政治的思想发生。所以社会哲学的发生,一定是在社会有病的时候;政治哲学的发生,一定是在政治有病的时候。

从历史上看去,要是人的身体没有病,一定不会发生医学、生理学、解剖学的。因为人的身体要遇了伤害了病,所以才有医学、生理学、解剖学。社会政治亦然,必是人类共同生活有了病,才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试看历史上希腊哲学的发生,正在他纷乱征战的时候。要是希腊没有这种纷乱征战的情形,决不会有柏拉图(Plato)、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等的学说发生。我的意见如果不错,那么中国各种学说发生,亦当如此。要是在老子、孔子的时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没有病,也决不会有老子、孔子两大派的学说发生的。

以上所讲的,不过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发生以前的原因,现在要讲发生以后的影响。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既因社会和政治有病,然后发生的,那么还是种空言病状的诊

书呢？还是种真能医病的药方呢？譬如汽车的汽，是呜呜然放出的呢？还是真能发动各种机械的呢？这一点是应当注重的，也是现在所应当讨论的。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论学理与事实的关系如何，就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对于实际的社会与政治有什么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派极端的学说：（一）是极端的理想派。这派以为学理对于实际有极大的影响，没有学理，便什么也没有。他们的缺点是忽略人类的习惯、自然的倾向和种种没有智识的行动。这是太理想的了。例如这次欧战，依这一派人说，以为都是两种学说冲突的结果。（二）是极端的唯物派。这派以为无论什么理想，都是物质的果，不是物质的因，学说不过是一种的果。这一派的人无论批评什么，都应用唯物历史观的。他们注重生活状态、政治组织和经济上的利益，甚至某种美术也说是某种生活所发生的。

这回大战，依唯物历史观的一派看去，完全不是思想的冲突，是物质上的冲突。德国在战前，物质发达已极，不得不向外发展，所以要争海上、商业、殖民地等霸权。就是英国方面，也有许多物质上的动机。这固是不错。但依这一派说来，简直完全是物质的，一切哲学、宗教都是物质所生的结果；甚至于正义、人道、文化等好听的名词，据他们说，都是资本家和军阀造出来哄人，做保护自己物质的器具，这也太过分了。我提出这两派相反的学说来，并不是想批评他，不过略为研究，好引起第三派的学说来。第三派的学说是最公平的。大概思想学说最初发生的时候，都是果而非因，但发生以后，他又变作因了。思想学说很像漏斗一般，漏了什么东西到什么地方去，便和什么东西发生关系。

思想学说一经传布到人,人有摹仿、崇拜的心理。在这人是果,传到那人又变因了。吾们对于思想学说在社会上政治上要他发生什么影响?所发生的影响怎样是好?怎样是坏?这是吾们要讨论的。

思想发生以后,第一种功用是把流动的变为凝固的,暂时的变为永久的。如有一件变迁不定、一瞥即过的事实,把他抽象的提出来,变了一种学说,便凝固了,永久了。这个关系,实在太太,往往引出危险。如罗马旧教把亚里斯多德的学说采为正宗哲学,便是一个例。又如东方孔子的学说,一经许多儒家的祖述,便二千年相续到今,也可以想见这种功用的利害了。

第二种功用便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维持许多人的信仰,去做很重大的事。例如这次欧战,只把自由、正义、公理战胜强权几个名词,可以使多数人去战争。这可证明唯物历史观一派的错误。若说这是资本家、军阀所利用的,那么吾要问他们为什么单要造这些空名词,这些空名词又怎样能号召人去打仗呢?于此可见学说的势力,也可见人类的动作,不单是物质的动机。

以上所讲的两功用,不单是好的学理有,便是坏的学理也有,不过好坏的效果不同罢了。吾们现在先讨论从前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派别,然后再讨论现在是否有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需要。

大抵这种派别,与人类性格的分类很相近的,不外激进和保守两派。激进派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政治,往往想把他根本推翻,另造一个乌托邦。

这一派对于现代社会政治,简直不睬,另有超于现在的

社会政治。从历史上看去,这一派往往在先,保守一派往往在后。例如希腊,先有柏拉图,后有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先不承认当代的制度,自己想出个“共和国”来做他的乌托邦;然后有亚里斯多德的保守论。又如中国,先有老子的哲学,后有孔子的哲学。老子不满足于当代制度,要去破坏他,另造个乌托邦,他的乌托邦是小国寡民,想诸位早已知道的了。

第一派的学说不承认现代制度,要求他理想的制度,所以注重个人,——一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良知、个人的本体,——第二派也不是满足于现代制度,不过以为现代制度不是完全不好,他本身也自有他的道理,后人没有照着 he 做,所以坏了,吾们只要去找出他原来的道理来改正或改良现制度便好了,所以趋于保守。

两派的区别:大概第一派主张抛弃现制度,另创乌托邦;第二派主张求现制度本身的道理;第一派注重个人的反省,第二派注重研究和考察。自从有了这两大派的学说,社会和政治事实,都受了影响,有许多人才,都是因此发生的,吾们所以不可不注意。

历史上固然有许多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派别,但是大概只有上述的两大派。我形容这两派学说,不免说得过火一点。吾的目的,是要说出社会、政治的背景。因为人类有一种通病,不是过,便是不及,前几千年的人类都吃了这两种极端的亏。人类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可以解决的。人类的责任,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出某种解决方法来,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这便是第三者的哲学。

上述两派,同犯一病,便是要“根本解决”。一派极端的什么都不要,可惜天上不会掉下个乌托邦来,所以他们流于无为。一派极端以为什么都有理,只要还到本身的道理去,可惜办不到。这两派虽各走极端,所犯的病却一样。

怎么可以使人类的智慧指挥监督他的动作,应付一时间、一环境的问题,便是现在要讲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二

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有种共同的趋势,便是创造社会的科学,关于人生的科学——把从前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的方法,渐渐应用到人生方面来。可见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今天所要讲的,便是这科学精神对于第三派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影响。

近世科学最初的起点,是和人生关系很少很远。所以第一步是天文学,进而为无生机的物理学、化学,再进而为有生机的植物学、动物学等。到现在,知道人生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结果发生了许多人生科学,如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宗教、历史、言语等学。这都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日用社会方面去。

这种种科学的发生,无论他的成败如何,但有一句话可以说,便是人类的思想变迁了。从前以为只有自然现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关于人生方面何等繁复,何等不规则,决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的。但是近来却知道人生虽是繁复,虽是不规则,也可分析到简单,并找出他的规则来,便也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这点可以证明人类的思想是

变迁了。

社会科学家发明了许多社会科学,但又看不起社会学。他们以为哲学是玄谈,是没有根据,不像科学有一定的律令,所以不值得去研究。

我并不想去批评他们,但是对于社会科学有一点可以说的:他们把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情形做了通则,以为百世而上、百世而下,东海、西海,都可应用的。例如科学的经济学发生很近,时代是十九世纪,地域是西欧。他们把当时当地的状况,找出条理来,做了经济学的原则,以为上下古今,都可适用。这是社会科学所常有的错误。

就经济学发生的事实来看:(一)当时的经济组织是大资本制度,出产很多,销场很广;(二)经济发展的方法是竞争的,不是互助的;(三)经济组织的目的纯在赚钱,不在社会公共利益。经济学上的各种通则,都是根据这种事实发生的,本是从一种特别情形特别事实底下的通则,如供求定律之类。他们却要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去应用,变了公共的通则,又不许人家去修正。所以嘉来尔(Carlyle)、辣斯金(Puskin)一辈人,要根本推翻这种绝对的定律,以为只可应用于一时一地,决没有这种普遍性的,后来又另创了一种历史的经济学。

刚才所讲的一节,用历史的眼光来批评他。凡是一时代所发生的通则,时代变了,通则当然也变了,所以没有一种通则可以称为定律。历史是继续不息的,通则也是继续不息的,所以无论那一天决不能得一最后的通则。

我所以提到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可以分两方面说:(一)消极的方面。社会在那里长

进,历史也在那里进行,所以要哲学去帮助他解说,不能单用描写或记载的态度,多少总要些理想。这是第一层。(二)积极的方面。社会科学发生之后,使人类思想变迁,知道人生的活动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他。然后社会哲学从空中楼阁里降下地来,使他带些科学的精神。这些精神是:(1)注重事实;(2)不尚武断;(3)不敢以为最后的;(4)不是天经地义,不过[是]拿来应用的假设。因此成了带社会科学色彩的社会哲学。

第二层意思,是说社会科学介绍了科学的精神与社会哲学,而成吾现在所讲的第三派社会哲学。这种哲学有三个特点:(一)实验的。从前的学说,都不根据人生日用的事实。现在这派学说,是人生日用处处可应用的,应用的结果,便可证明或反证这学说的好坏,吾们便可把智识和学理来指挥向导我们的行为。(二)特别的。从前的学说,不是笼统,便是普遍。现在这派的学说,是不用全称,不是笼统,都是特别的,没有普遍的。(三)他的目的,在养成智识观念,可以随时随地补救特种情形,解决特种问题。

这种新的社会哲学,把智识学说看作指挥人生的一种工具。科学本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科学,一种是应用科学,现在可以应用科学比这种新的社会哲学。纯粹科学不把人生欲望与意志放在里面,这种社会哲学把纯粹科学的道理应用到人生欲望、意志上去,不但不排斥欲望与意志,还把学理去帮助欲望与意志,使他不陷于痛苦,不往邪路上去。

纯粹科学完全是旁观态度。譬如天文学,月亮的圆缺,都不与吾们相干,我们的欲望与意志,一些也不能加入。应用科学[则]不然。譬如医学,把医生自己也作研究的一部。

吾们研究社会哲学,要用应用科学的态度,以学理帮助指导人的行为去达他的目的。这是工具主义的态度,便是实验的态度。

社会哲学不是纯粹科学,乃是应用科学。如经济学的目的,是帮助人类经济的活动,向那一方面走,才能得到最大最多的生活。政治学也是如此。政治要怎样组织,才能得到最大最多的人生幸福。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指导他们:那是对,那是不对。这便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哲学的关系。

再把医学来作个例。有一种是画符念咒、说病卖药的游方医生所用的医学;有一种是根据科学的医学。科学的医学把智识来指挥、帮助他的技术,可以使人生得到利益。社会科学亦然。从前没有学理来指挥、向导人类的种种行动,便万事听皇帝,听长官,以为有好皇帝、好长官,便有好政治。这都是听天由命去碰机会的。推而至于各种人类的科学,都是如此。不要靠天、靠旁人、靠机会,要用科学的智识来指挥一切,向导一切。

简单说,社会哲学何以要把他当作科学来研究,第一点,是现在人类进化到这样地步,交通便利,调查容易。现在要去调查各种社会、政治的情形,都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倘再不利用现在的文明,把科学的智识来指挥人类社会、政治的行为,可以发生很大的危险。偶然的一件事,便把几千年辛苦经营的东西都废坏了。

第二点,关于方法,从前是笼统的、抽象的、理想的;现在是个体的、特别的、事实的。须要注重个体特别事实与通则通例的关系。如社会哲学要研究各地各种的时势,使与